

看见你们格外亲

○钱家骊 (1953 电机)

在校庆前，先后接到赵诚和魏振基两位同学邀我参加高4班毕业50周年聚会的电子邮件和电话，非常高兴。高4班同学也已经毕业50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呀！

我作为一个教师，半个世纪来教过很多班同学，屈指算来，其中最熟悉的也就是十个班，都是和同学“摸爬滚打”过来的，高4班正是其一。我教这个班一门课“高压电器”，指导过一个课程设计，带过一次生产实习和参加毕业设计指导，又担任过教研组管教学的秘书作教学计划的修改和毕业设计的安排，教研组还分别和高41和高42班举行过两场篮球友谊赛，与高4班有关的事不能算少，印象当然也就比较深刻了。

我教高4班有个重要的个人背景，那就是我是1959年反右倾期间，作为全校批判的“新富农”的代表人物，可以说是全校闻名。在我1961年5月底从八达岭绿化基地奉命返校，做了“甄别”，恢复党籍后，我又能做教学工作了。这时，戈以荣老师正准备秋季开学后给高3班开出“高压电器”课。因为我以前已经开过4次这门课，戈老师认为还是由我开这门课较好。我想了一下觉得戈老师既然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，那就不必再换人了，这一年我还有些想好的事要做，等到高4班的高压电器课时再让我来开吧。

这一年我想要做什么呢？那就是花些

力气争取把这门课开得好些。照理说，此前清华来过哈尔科夫工学院的奥梅里谦柯副教授，哈工大来过莫斯科动力学院的里沃夫副教授两位电器专家，但可惜他们都不大懂高压电器，也没有带来高压电器教科书和讲义。前此我开这门课主要是靠看苏联有关书籍和下厂实习包括车间实习、看图纸、看试验报告等资料和向技术人员请教才勉强开出。这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，清华正在“就地卧倒”，一切政治活动停止。于是我就有了时间按高压专业情况编写了《高压电器》上、下两册讲义。这个讲义把以前的讲课内容作了不少改动，包括加强基础内容，加强物理概念，减少繁琐的产品结构叙述，改正苏联书籍的一些错误，用更简单的方法重新推导了一些公式，引进西方国家和日本书籍的一些内容，比过去总算有了个像点样子的讲义了。回想起来，那时能够十分投入地、无拘无束地又从从容容地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感觉真好，虽然我那时的水平也就是那样。

开始给高4班上课了，我虽做了充分准备，但还是有些忐忑不安，不知会有什么反映。哪知道第一堂后，唐绳斌同学忽然来到实验室找我，对我的第一堂课大加肯定，使我深受感动。以后晁学贤又多次和我闲谈，虽然话没点明，但我从他的眼神里充分了解他的用意。课代表李学敏同

学也在课下充分给予配合，其他同学学习也都十分努力，这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手里还一直保留有李秀纪同学的课程设计报告，那时所用的纸张又黑又脆，但书写十分工整，表现出同学的努力和功夫所在。直到后来学校大图书馆专藏部找我要一些半个世纪的教学材料时，我才把它上交。

我带高4班实习时，因为是经济困难时期，只能在北京开关厂而不能去沈阳和西安的大厂，可实习的内容很少，产品水平也低，但同学仍很努力。我只记得当时发生的两件事：一是田桂蓉同学在浴室晕倒。我知道她是体育代表队的，体质应当不错。后来才知她是射击队的，又值经济困难时期营养跟不上才造成的；另一事是工厂经常在晚上开舞会，校文工团、班上抒情男高音歌手肖运鸿在舞会上引吭高歌，大受工人师傅欢迎。我也很高兴。

时光飞逝，离开那时有半个世纪了，虽然记忆力大为衰退，但对高4班很多同学的声音笑貌仍未能忘怀。首先看到的是唐绳斌，他是用车来清华接吴维韩、吉嘉琴、朱德恒几位老师和我的。吴老师因为和他有业务上的联系自然很熟，我和他虽多年未见，但他还是老样子，还是那样热情。到了会场，首先看到的是一表人才的周仲麒，我以前也见过他几次，知道他在北京邮电大学工作，挺不错的。看他虽然有些白发，但身体仍然不错，这也是当年投掷运动员的风采吧。我很快又看到了高个子的程玉兰同学，我早知道她在电器设备红外测温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。分到内蒙的陈献武同学很久没见了，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。

李树霖还是老样子，他很能创业，做得风生水起，一谈起来，兴致很高。中国电科院的刘富波和魏全才来了。刘富波是同行老相识，魏全才的名字一直未忘，但见到人却有些迷惘，看来我真是老了。有人说北开的鹿秀英因病来不了了，但我看见桌子对面有位女同学对我笑而不语，我赶紧一问，原来就是鹿同学，看不出什么病容，只是脸圆了些。邹嘉鏊还是老样子，他的军事生涯和房地产都很出色。可惜的是他的发言传递的同学信息太少。我问周华俨同学怎么没来呢？我上次看见她身体还很好，脸色白里透红，还是老样子，谈起她的青海生涯滔滔不绝，怎么现在病了。而据同学说同去青海的戴达智同学却在运动中受罪不少，真是不幸。

一些同学英年早逝，使作为老师的我也很难过。女同学周燕仪、白燕义和田桂蓉走了；王惠仁工作干得真不错，在北京电力科学研究院做了领导，却也走了，令人不胜惋惜。我看到了罗建平同学，十分令人惋惜的是黄湘岳同学不在了。他，我是很难忘的，一张圆圆的脸，吹得一手小号，见了我总是与众不同地行一个90度的鞠躬，使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就在毕业多年后，我到他家时，也还是这样。分到母校的袁德宁同学，由于分在教务处，以前也和我常见面，现在也不在了。

又看到晁学贤同学了，他有很好的创业，做了不少高压产品。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手，两眼中还是露出和过去一样的十分关心的神态。我看到了林集明同学，在工作中，他和我是互惠的关系，他会给我解答一些技术问题，他也接受了经我指导或辅导的3位研究生，这种关系真好。

□ 荷花池

冯永禄同学分在北京开关厂，和我是同行。我们还有一次合作，那是上世纪70年代，他率队到清华振荡回路实验室作断路器开断无载长线的模拟实验，这个项目后来还得了科学大会奖励。

我还很想念李秀纪同学，但几十年一直未见过面。他在厦门干得不错，担任过市人大秘书长，由于厦门官员出了不少问题，我也曾十分多地为他捏过一把汗，但他还是保持了应有的本色。在纪念清华大学电机系成立70周年时，我被系里找来作文字组稿和编辑，还请李同学写了一篇有关他的工作事迹的稿件。

文郑麟同学的经历是坎坷的。他原来是自9班（自动控制专业）同学，成为自9班的学生可是叫人羡慕的，那是从一堆既是政治尖子又是业务尖子中选拔出来的，一共24名学生。但可惜的是1957年整风反右一役，25%的同学沦为“右派”分子，文同学也是其中之一。我手边还存有批判他的已经发黄了的油印小报，标题就是《文郑麟为什么是右派分子？》后来他在高压实验室劳动几年后终于转成高41班学生，晚毕业了5年。他学习成绩还是很好，毕业后分到醴陵电瓷厂，后来成了该厂的老总，总算不错。以后他还跟我讨论过高压电流互感器的磁通分布问题，多少还有些联系。

高4班毕业离校时，我已率队外出实习，不但无法欢送，也不知道各位同学都分到何方，直到我回校才知道分配的大致情况，有3位同学——曾大雄、周胜宗和肖运鸿成为清华的研究生。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他们也未能毕业，他们的分配地点还是我按上级确定的3个名额分配的。

周胜宗同学是分配到高压电器组作研究生的，他很聪明，在工作单位很受重视。但十分遗憾的是他因为车祸英年早逝。那次事故对清华高压专业是个极为沉重的打击，王伯翰（1958届，清华教授）、王凤鸣（武高所高工）、王仁甫（1965届，博士，西安高压研究所总工）和周胜宗几位出类拔萃的校友同时遇难。电机系派我去烟台协助处理后事，那些悲痛的日子是很难熬的。

终于聚会快结束了，忽然背后有人叫我，我一回头，原来是鲁光莹同学，也许是前几年我和她见过面，我觉得她还是老样子，没什么变化，于是十分高兴地和她握握手。可惜还是有很多同学没能见面。

聚会的时间过得飞快，分别的时间到了，我在诸多同学的笑脸中，接受他们的关怀和祝福，这让我十分愉快和满足。教师节是我们教师的节日，但我感到我最快乐的节日却是校庆日，在这天我会看到很多久违的同学，看到他们的笑脸，得知他们取得的成绩。这是作为一个教师最最高兴的时刻啊！

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教师，没有得过什么大奖，甚至也没得过什么中奖，但在培养众多同学中总算尽了一份小小的力量，这些力量应当有所收获，这就是给我的最高的奖赏。

什么是教师的生涯呢，我想起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的几句诗：“在我生命的瓶里，永远开着不落的春花；一舟划过，一舟又来，舟舟载走我的逝水。”

一个人只有一辈子，这辈子，我能当一个教师，教过这么多好学生，这真是很值得很值得啊！